

名刊观察

“百花时代”文学期刊改革的历史考察

王秀涛

1949年以后文学期刊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人刊物和商业刊物逐渐被取消,“过去一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既是所谓同人刊物)”的办刊方法“已经过时了”,原因在于“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起思想领导领域里的问题,一切生活中新思想和旧观念的交战的问题”。文学期刊的定位与职能被定于一端,其办刊思路与管理办法也存在着政治化、行政化的特征。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了文学期刊的状况,其调整的方向与以往截然不同。中国作协还在11月召开了文学期刊工作会议,意在推动文学期刊的改革,并提出了可以创办同人刊物等以往不可能提出的主张。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调整无疑是十七年文学期刊发展的重要现象,但这一现象还未得到学界的全面研究,回顾、总结这一段历史,能够还原“十七年”文学期刊发展历程的复杂性,丰富我们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认识。

—

文学期刊的改革是1949年后文学期刊越来越僵化、走向极端的一种反应。因此,一旦环境允许,作家、编辑就

开始表达不满和改革的要求,而“双百”方针的提出无疑为文学期刊调整也营造了宽松的文学环境。1956年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艺术的“春天”,有学者把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称为“百花时代”,这种环境的形成成为期刊调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949年以后文学期刊大多以机关刊物的形式存在,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它被视为“我们的喉舌”、“我们与群众联系的最密切的工具”,“最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司令台”。这种政治定位使文学刊物担负着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思想斗争的任务,所刊发的言论“就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标准”,编辑部人员“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们就应该具有高度的明确的思想性,最能判断是非轻重,敢于负责地表明拥护什么,鼓吹什么,宣传什么和反对什么,而且是热烈地拥护和坚决的反对”。

为了明确文学期刊的这种职能,发挥其配合政治的工具作用,文艺界掀起过一次期刊的调整运动。1951年11月20日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调整的原因是这些刊物不能达到“有明确的战斗目标,强烈的思想内容、生活内容和群众化的风格,成为文艺事业的不断的革新者”的要求。这次调整按照“少而精”的原则,着重加强《文艺报》、《人民

文学》、《说说唱唱》,停止出版《人民戏剧》、《新戏曲》、《人民音乐》、《民间文艺集刊》、《新电影》停刊,加强《大众电影》。全国文联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改进问题也很关注,不但在《文艺报》上刊发多篇文章进行探讨,而且全国文联研究室还专门进行调查研究,撰文对地方文艺刊物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文章认为地方文艺刊物存在着“无领导无计划的自流现象”,刊物之间“缺乏适当的分工”,“方针不明确,未能面向本区群众,贯彻通俗化、大众化的方针”,因此“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并提出“刊物的方针和读者对象必须明确”,“与当地群众斗争紧密结合”等进行期刊调整的意见。

1951年11月的文艺界整风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文学刊物的调整运动,在11月24日的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大会上,丁玲指出了当时文学期刊存在的问题,譬如“思想性不够,任务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刊物的负责者没有足够的责任感”,“缺乏自我批评,也害怕批评”,“个别的刊物还有小集团的倾向”,“在思想上远远落后于群众思想斗争的实际”等,号召文学期刊“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在此次文艺整风过程中,各文学期刊都进行了内部的思想检查。《人民文学》编辑部就认为,“必须通过这次学习,改造我们的工作,使《人民文学》成为真正贯彻工人阶级思想领导和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的、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勇敢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也就是说,真正符合今天人民需要的文艺刊物”。文艺整风后,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已得到基本的实现”,“《文艺报》、《人民文学》的工作,已有所加强。《剧本》和《歌曲》的出版,适应了群众的需要。但所有刊物都还未完全实现调整刊物决定所规定的任务,还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还要继续加强和提高”。

此次文学期刊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譬如有人说,“自从地方文艺刊物的方针、对象、任务逐步明确了以后,许多地方文艺刊物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扩大和加深了文艺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但这种“进步”却对文学期刊造成了进一步的约束,譬如河南的《翻身文艺》“本来充满着各

种各样的内容和形式”,“后来省里办了《河南大众报》、《河南青年》、《新河南妇女》等报刊,为了实行分工,这个刊物便以供应群众演唱材料、供应农村剧团剧本为主要任务”,实行分工的结果是“来稿公式化、概念化,水平提不高,组织不来好稿”,刊物的发行量“降低得很厉害,最高印数是五万份,最近一期只印了六千七百多份”。而中央级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在加强了思想性和战斗性后,“看一看情况,真是空虚的很,一个《人民文学》,都苦于没有文章,一个《报》,也是七拼八凑,这中间又急于以棍子征服人或甚至杀人,做尽了坏事,你看,这能成什么气候?”

1956年召开的文学期刊工作会议的目的就在于改变文学期刊的现状,中国作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据负责筹备此次会议的郭小川在日记中记载,早在4月份中国作协就准备召开编辑工作会议^①,此后郭小川多次在日记中提到作协书记处会议讨论过此次会议的召开。郭小川还于9月份赴上海、武汉等地访问作家和编辑,并与文学期刊编辑进行座谈,为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做准备。从编辑和作家的发言来看,都对文学期刊的现状表达了不满,反映了当时文学期刊存在的问题。一是刊物内容千篇一律,譬如“文章千篇一律,什么题材都写成小说,‘人往高处走’,过去《人民文学》形式狭窄,一般作者也竞相学习。剑拔弩张、盛气凌人的多,流畅的少;思想抄袭,模仿性大”;“反映旧社会的东西太少”;“《人民文学》的诗都是一样,都是新疆蒙古,四行一节,几下子一搞,有些胆怯了”;“《文艺报》一发表趣味就差不多”;“学校一般同学对《文艺月报》意见最大,都是应景文章,长期都是如此”。二是刊物缺乏自身的风格,定位不明确。有人指出,“刊物的方针性质不明确,要创造出风格不易。甚至不同意,看法不一致。究竟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以后报刊应想办法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风格。以后把门打开,不要千篇一律”。三是编辑思想上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有人反映,“检查刊物,脱离政治是对的,但认为重视艺术也是不对的,政治也是硬性配合政治,为工农兵就是登工农兵作品”,“现在把题材和形式绝对起来。把特写绝对化,时代感和时代‘赶’。订计划时反映工业、农业各多

少篇也是不对的”。“作者经常按编辑要求写稿,逐渐就摸到了脾气”,需要“减少机关化,增加社会化”。^⑫郭小川此次外出访问座谈的内容也成为召开编辑工作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经过整理后成为“后来在会上通过的《编辑会议纪要》,也是周扬、茅盾等人讲话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参考资料”^⑬。

文学期刊存在的诸多弊端,使得文学期刊的调整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同时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使得期刊的调整具备了可能性。早在1956年年初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对知识分子相关政策的改变,已经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放松。文艺界在2月份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以及3月份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都意在改变此前文艺界的沉闷现象,消除知识分子因胡风事件造成的心理压力,这也是1956年进行文艺调整的重要开端。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筹备的。

“双百”方针的提出无疑是1956年文艺界进行文艺调整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论十大关系》的讨论做总结发言,提出“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⑭。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界、理论界、文艺界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提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并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⑮

在编辑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人民文学》已经做出了调整和变革,这为编辑工作会议和其他文学刊物的调整做了示范。1956年秋秦兆阳就制定了《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主张“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在发表作品时,应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以提高质量,树立刊物的独特风格,为今后

改进的中心问题”,“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不因政治标准而忽略或降低艺术标准,但在具有特殊性的作品面前,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等共计18条。^⑯秦兆阳的这些计划代表了他革新《人民文学》的指导原则,在他主持下,《人民文学》发表了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从1956年5月开始陆续发表《爬在旗杆上的人》、《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揭露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同时《人民文学》还发表针对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探讨文学规律的论文,譬如秦兆阳署名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以及“文艺短论”和“创作谈”栏目上的文章。

可以说,政治环境的宽松,《人民文学》的表率以及文艺界所形成的共识使得文学期刊的调整运动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而1956年11月份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则为其提供了政策基础、理论基础以及调整的方向、方法等具体指导。

二

1956年11月21日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开幕,“在一开始,就确定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⑰。而且按照周扬的主张,“这次会议也要彻底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议不做报告,也不做结论,大家把意见发表了,也就完了”^⑱。因此此次会议也与以往不同,“在会议的开头,没有工作方面的总的报告;只是由作家协会的三位副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具体内容不同的启发性发言。会议首先放手让大家充分地、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谈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意见,对各个有关方面的批评、建议。由于各个刊物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会议在最后也没有做出总的决议,而是将大家的讨论当中对一些重要问题所取得的共同意见,写成一个‘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纪要’,供各文学团体、各文学期刊编辑部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参考执行”^⑲。

会议于12月1日结束,对于学期刊的改革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认为要真正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必须大胆放手,敢于在刊物上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开展自由论争;发表多种多样形式的作品,并且促使各种文艺形式得以发展;敢于干预生活,发表批评现实生活中的缺点的作品;要办好一个刊物,必须要求每个刊物各自有着鲜明的主张,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会议提出了几项新的措施:从1957年1月起,全国各个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名义;文艺团体对所属刊物只作原则方针上的领导,不干涉其日常编辑工作;全国各个刊物之间没有指导或领导关系,彼此都可以相互批评;每个刊物都要有一个团结的有创造性的编辑部,要充满着学术上的自由论辩的空气和严肃的工作作风;^{②0}各刊物之间去掉那种不成文的指导或领导的关系,大家平等,展开相互间的批评和竞赛;一律实行企业化的管理方法。刊物不能自给的部分,由国家补贴。作家协会所办的已经有了较大影响的刊物,实行定期自给,在不能完全自给的时期,实行计划亏损办法。^{②1}

此次会议无疑为文学期刊的改革准备了政策基础,推动了1957年的期刊改革运动。一方面,新创刊的刊物大量出现,不下十数种,如《诗刊》、《星星》、《新港》、《收获》、《延河》、《雨花》、《东海》、《园地》等等;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刊物的行政化色彩,突出自身特色,在会议前后出现了期刊改名的潮流。《山东文艺》更名为《前哨》,《山西文学》更名为《火花》,《西南文艺》更名为《红岩》,《贵州文艺》更名为《山花》,《河北文艺》更名为《蜜蜂》,《湖南文艺》更名为《新苗》等等。^{②2}更名当然并不是改变名字那么简单,体现了刊物追求改变、体现自身独特性的意图。譬如“为适应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和发展的需要”,1957年1月《甘肃文艺》更名为《陇花》,编者指出:“从今年起,《甘肃文艺》改为《陇花》,陇是甘肃的简称,从字义上讲,陇是地里的垅坎,花是象征着‘百花齐放’的意思。那么《陇花》这个刊名,包含着两种意思,它是我们甘肃省文学创作者的园地,这里将培养文学创作的幼苗,在这个园地里,将开放出甘肃省文学创作的花朵。我们欢迎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作品‘百花齐放’,只要是‘花’就培育它,使其开放。”^{②3}

改变审稿、选稿和组稿的标准是大多数文学期刊改革的重要思路。1957年创刊的《星星》在第一期上就发表

这样的主张:“我们欢迎各种不同流派的诗歌。现实主义的欢迎!浪漫主义的也欢迎!”“我们欢迎各种不同风格的诗歌。‘大江东去’欢迎!‘晓风残月’也欢迎!”《星星》创刊号发表了有关爱情的诗《吻》、《收获期的情话》、《大学生恋歌》、《湖上情歌》以及《草木篇》等。《人民文学》推出7月特大号,刊发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小说,穆旦、汪静之、康白情的诗歌,以及沈从文、启明的散文。沈从文的《跑龙套》是《人民文学》专门组稿而来的。^{②4}1957年创刊的《诗刊》在组稿方面也同样如此,据吕剑回忆,“创刊之初,在团结各派诗人以及组稿方面,都企图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我们首先发表了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这首诗的构思及其表现手法,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公刘的《迟开的蔷薇》,就是冒着风险发出的,那时‘爱情’在文艺作品中是个禁区,我们既请张光年评论郭沫若,也约陈梦家来读徐志摩,徐这个题目一直是犯忌的,除了关心新人之外,正如徐迟为吕亮耕诗集作的序中所说,我们也还想打捞一下‘沉船’”^{②5}。

文学期刊的改革还体现在期刊的管理和体制的变革方面。一方面期刊极力淡化行政化色彩。《诗刊》创刊时编辑部无一人是党员,其编辑制度也极力维护编辑部的独立性:“坚持质量第一,决不盲目崇拜名人,也不轻视无名小辈。在编排目录时,根据内容质量而不是根据作者名气来确定先后顺序。在稿件处理中,不论对著名诗人或文艺界主要领导推荐来的作品,只要质量不够,就提出意见与之商改或婉退,甚至还曾大胆退过诗坛巨匠郭老的诗作。”^{②6}有文学期刊编辑在回顾自己所编刊物未改革前的状况时说,“我们的刊物在改版之前,有一个时期还规定了各种题材在每期刊物上所占的百分比,甚至为此降格以求;为了配合政治任务,编辑人员每逢2、5、8、11月拟定下季选题时,都先到党委了解下一季度的中心工作”。但他认为文学期刊会议后各地方文学期刊仍然缺乏个性,原因就在于“刊物机关化,是刊物缺乏个性的主要根源”。他主张“党委对于刊物的领导,主要是多关心、多研究、多指导,而不是多动手。如果具体到审稿、看大样都管,这只会抓了眉毛,丢了辫子。刊物编辑部的事,原则上由刊物自己管,党委和文联可以委托一两个人负责刊物

领导工作,刊物的内容、风格……由他们去确定”。^⑦可以说,去行政化是当时文学期刊的普遍追求。

许多文学期刊都进行了这种去行政化的尝试,因此在“反右”斗争中这种行为遭到强烈批判。“他们把省市宣传部对刊物的领导叫做‘干涉’,并且动辄就叫嚣起来,这不应该‘干涉’,那不应该‘干涉’;干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他们说什么‘刊物应该独立自主’,‘发挥编辑部的创造性、积极性’。”《新苗》主编、民盟盟员魏猛克遭到批判,认为他“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就趁机把《新苗》‘独立自主’起来了。他非法剥夺了原来编委会的职权,把党员和进步的编委拒之于门外,有关编辑部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编辑方针、体制、分工等),既不向党委汇报,也不召开编委会研究讨论,而由这个右派主编独断独行”。^⑧虽然这些政治批判难免夸大其词,但从批判中不难看出文学期刊在刊物管理和体制方面做出的革新。

1957年还兴起了出版同人刊物的尝试。周扬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可以创办同仁刊物。1957年5月周扬在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办成圈子较小的同人刊物,当然也可以”^⑨,这无疑激发了文学界创办同人刊物的兴趣。据敏泽回忆,“唐因、唐达成建议我们可以一起办一个文学上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同人刊物,希望我能跟陈涌讲一下。陈涌表示,如果雪峰参加他可以参加”^⑩。郭小川本人也曾经有过办同仁刊物的打算,他在“文革”时期的自我批判中说,“我自己还想自己办一个同人刊物,这所谓同人,不仅包括李兴华、杨犁、苏中、涂光群、杨志一这些人,而且还想拉林默涵、楼适夷等等一起办,后来因为林默涵从文艺黑线的全局考虑认为不需要,而应集中力量办好已有的反党喉舌如《文艺报》等等,才没有办出来”^⑪。刘绍堂和友人也有过创办同仁刊物的打算,据他回忆,“党中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激动人心,形势大好,李岸热情沸腾,倡议仿照苏联模式,筹办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文学刊物,刊名和苏联的一样,叫《青春》。他要求我担任主编,唯熙和他担任副主编,杂志实行股东制,每股一千元。我接近上层,认为不会允许创办同仁刊物杂志,李岸要我试探一下”^⑫。

据“反右”时期的批判文章看,全国出版同仁刊物的

举动还有很多,譬如“以韩秋夫为首的右派集团,打算在篡夺《青海湖》不得手以后,即创办一个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和低级趣味的‘同人刊物’——《夜莺之友》,来和《青海湖》唱对台戏。在贵州省,以钱革、杨守达为首的右派集团,准备出版同人刊物——《文学青年》”^⑬。

这几次创办同人刊物的尝试并无付诸实践,江苏作家创办的《探求者》杂志则起草了《章程》和《宣言》。据陆文夫回忆,1957年6月6日他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一起“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⑭。陆文夫起草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提出,“本月刊系同人合办之刊物,用以宣扬我们的政治见解与艺术主张”;“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创作方法也应该多种多样”。高晓声起草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则表示“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来源就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的艺术风貌……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⑮随着形势恶化和“反右”斗争的开始,《探求者》未能创办但依然遭到批判,其《章程》、《宣言》也成为对他们进行批判的依据。

期刊工作会议为期刊改革指明了方向,其决策也为期刊改革提供了政策保证,但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期刊改革尝试,也说明1949年以后文学期刊制度存在的弊端,其审稿、组稿等制度制约了文学发展的多样化,尤其是文学期刊作为机关刊物的行政化色彩也造成了期刊管理上的缺陷。

三

期刊改革是“双百”方针的产物,就像吕剑所说的,“如果没有一九五六年的气候,就不会有《诗刊》,《诗刊》的创刊曾经被看做是一个吉兆,是文艺界摆脱束缚,走向舒畅的信号”^⑯。可以说1956年到1957年的文艺调整和

期刊改革是特殊政治时期的产物,一旦政策有变,这些改革和调整的合法性就会丧失。而且就是在“双百”方针时期,文艺调整也不是毫无限度的,同样要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规约,对政治正确的坚持也是首要的条件。

因“双百”方针所形成的“百花时代”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本身是有底线的,毛泽东就提出过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指出“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活动都是适用的”^{③7}。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并不是任何主张和改革都能够被接受,“毒草”只能被批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样要坚持必要的政治标准,因此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主张改革的同时也形成了这样的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绝对不是要我们把思想斗争的旗帜收起来,而且要把它举得更高。我们的刊物必须站在先进的立场、党的立场上成为宣传先进思想、先进事物、先进艺术的阵地。既然是‘争鸣’,就必须‘争’,通过说理的而不是粗暴方式,在刊物上对落后思想、落后事物、落后艺术进行斗争。”^{③8}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文艺界内部很多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持一种担忧和谨慎的态度。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对会议的决议大都表示拥护,但《萌芽》主编哈华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样搞下去没人坚持党的文艺路线了。我们办个《萌芽》就是想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③9}。执行文学期刊改革的编辑在进行变革时也都以政治安全作为考虑因素。主持《人民文学》的秦兆阳虽然对刊物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但其在此次会议上的言论反倒显得有些保守,他认为办刊物只能“大同而小异”,大同即“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方针,这些都是同的,如果这些东西不同,那就是根本的不同。又如昨天周扬同志讲的跟唯心主义进行战斗,这是应该同的,虽然我们的刊物可以发表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和实际上的做法都是相同的”。他认为刊物的风格、特点不是主要问题,最主要的是“我们刊物所担负的任务。我们要教育读者,至少要引起他们动脑筋,而要引起他们动脑筋,我们得有本钱。我们不是为风格而风格,我们是为了读者,为了提高读者的水平,我们得给他们东西,这是刊物的最主要的

任务”。^{④0}秦兆阳在“文革”后回忆自己的编辑生涯时,也颇为自豪地说,“凡我主持编辑的刊物,从未忽视文学与政治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特点,总是力求掌稳方向,不为文艺思潮复杂多变的奇风怪雨所动”,“凡我经手的稿件,无不字斟句酌地注意思想艺术的社会效果”。^{④1}有人研究认为,秦兆阳在主持《人民文学》改革期间“流露出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真诚”,所刊发的干预小说也“以矛盾的面貌出现,而不能走向彻底”,“无论是版面安排或者推荐语,都不脱一种总体的框架,对政治性的认同和确认”。^{④2}

文艺界内部对“双百”方针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尤其是一些地方行政领导对这一方针并不完全赞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艺界的调整 and 期刊的改革。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由于提倡百花齐放,“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陈沂也发表了《文艺杂谈》,同样担心由于“双百”方针的执行造成文艺界的混乱。针对这种状况,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强调,“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很不理解”^{④3}。同时表示,“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④4}。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指责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文艺杂谈》是阻碍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④5}但毛泽东的意见却在传达时出现了反差,“这次书记会议以后,不少省市传达时说:毛主席是肯定四人文章,说他们是为党为国。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有的加按语肯定,并配发拥护文字。有的地方还开座谈会拥护四人文章

并检讨本地区1956年文艺工作中的‘文字’。这可能是未听懂毛泽东的讲话,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同四人文章有共鸣”⁴⁶。

1957年创刊的《星星》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期刊改革所经受的政治压力和阻力。《星星》创刊号因发表情诗《吻》,“被《四川日报》上一位署名‘春生’的批评家,在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一篇文章里面,斥之为‘色情’的作品,并认为《星星》把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星星》编辑部为此写了反批评文章,但被《四川日报》压住不发,因为写《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春生”是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据石天河回忆,“我们坚持按‘百家争鸣’的原则,应该容许反批评。报社不发,我们就准备自行印发。这就引发了一场大祸。四川文联领导以‘机关大会’的形式,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陈谦等人,进行了压制性的批判,并给了我‘停职反省’的处分”。后来因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对《星星》和《草木篇》的问题说过一些话,才撤销了对石天河等人的处分。⁴⁷

虽然“双百”方针的执行使得文学环境得到了一些改观,但文学期刊的根本性变革也是不允许出现的,因此同仁刊物的创办大多是一种设想,并且遭到一些具有政治敏感的老作家的劝阻,他们凭借政治经验意识到办同人刊物的政治风险。譬如刘绍堂为筹划创办同仁刊物《青春》曾向康濯、邵荃麟寻求意见,“我首先听取康濯同志对创办《青春》的意见,康濯同志劝我慎重,我又找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请教,荃麟同志极力劝阻。于是我叫维熙转告李岸,办刊一事不妥,便回乡了”⁴⁸。陆文夫、方之在筹划创办《探求者》杂志期间曾向巴金询问意见,据巴金回忆,“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⁴⁹。而敏泽等中国作协内部工作人员在筹办同人刊物时更是小心翼翼,据敏泽回忆,“当时,为了避免被人抓把柄,决定群众一个都不吸收,唐因是党员,唐达成和我是共青团员,这样做是免得别人说搞非党的活动。我们只是口头上简单地商量过,雪峰和我都问过(郭)小川,周扬的话算不算数,如果算数,时机成

熟就办”⁵⁰。可见在经历过政治风雨的老作家看来,文艺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即使眼下政策允许的事情也并不见得具有可以实施的合法性基础。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⁵¹。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开始。文艺界的调整和文学期刊的变革都被视为反党行为。《人民文学》被认为是“代表了修正主义的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中国作家协会很快编印出来供内部阅读的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学》毒草集,集中理论方面,除收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还收入了近半年以来,包括5、6、7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很多评论、杂文,有李清泉用笔名写的批评社会上右派的杂文、编后记和笔者及编辑部其他编辑写的短论和杂文等。作品则赫然收入了李国文、宗璞等刚发表的新作”⁵²。文学期刊上“毒草”的出现被认为是期刊编辑的政治责任,譬如李希凡在批判《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时认为,《人民文学》是这类作品“代销的市场”,他认为《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受到《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捧场之后,刘宾雁才敢于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赞扬之后,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只是《本报内部消息》一篇,《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的‘编者的话’,就费去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推荐这篇有着露骨的反党目的的特写,谁能说编辑部没有它的态度呢?并且直到最近他们还在继续推荐《改选》、《红豆》这样的毒草和莠草,却看不到他们对于放出的毒草,作过任何严肃负责的交代”。⁵³

文学期刊的改革被看做是篡夺文学领导权的行为,《文艺报》在刊发的批判文章中就指出,“根据报刊所揭发的材料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好多文艺刊物都被右派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篡改了刊物的政治方向,只是轻重程度不同罢了,这种情况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三类:一、右派篡夺了领导权并在编辑部内占优势地位的有:《江淮文学》、《芒种》、《星星》;二、右派把持了刊物的而偷运毒草的有:

《新苗》、《长江文艺》、《热风》、《东海》、《蜜蜂》;三、没有被右派分子篡夺去领导权但有右派分子活动的,这就比较多一些,不必列举”⁵⁴。

文学编辑和筹办同人刊物的作家也难逃严厉的政治惩罚。1957年6月24日到7月8日《文艺报》陆续举行了5次全体人员大会,“展开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和尖锐的斗争”,会议“揭露党员唐因、唐达成等人对党的领导抱有严重的对抗情绪。他们要求大鸣大放,实质上是把文艺报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唐达成要求编委会‘敲作家协会的大门’……同时有的编辑为了拒绝党和作协的领导,竟然提出文艺报编辑部应该‘六亲不认’的荒谬论调”⁵⁵。筹办《探求者》的方之、高晓声等人也遭到严厉的政治打击,《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被认为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⁵⁶。“反右”斗争使大批编辑被打为右派,“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几个刊物,没有一个不被认为是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它们的主要负责人(主编、副主编、编委、编辑部主任)绝大多数不是被错化为‘右派’,就是受到‘留党察看’、‘严重警告’等党纪处分”⁵⁷。

结 语

文学期刊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文学期刊不但没达到改进的目的,反而在办刊思路上更加倒退。在“反右”斗争的震慑下,报刊方针和编辑行为更加保守,各地文学期刊被重新调整。中国作协书记处为改革刊物提出了“明确方向,加强领导、缩短战线,充实力量”的改进刊物工作的方针,同时“为集中力量办好刊物”,决定从1958年起将《文艺学习》与《人民文学》合并,将《文艺报》改为以文学评论为主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评论的半月刊。并指示所属各刊物按照上述方针切实改进工作。这次改革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纠正此前改革所犯的错误,“改组后的《人民文学》,将纠正过去一个时期内所犯的修正主义错误,同时接受《文艺学习》一度把青年读者引入右倾迷途的教训,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刊物”。⁵⁸文学期刊改革的失败可以说是“十七年”的文学体制的必然结果,其

改革的限度和对必要的政治标准的坚守也是社会主义文学作为“工具”文学所具有的特征。虽然这一时期的期刊改革对此前文学期刊的弊端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根本性的变革是不可能出现的,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在文学体制的根本特征无法变革的条件下,期刊改革只能是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

【注释】

①丁玲:《为加强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文艺报》第五卷第4期。

丁玲:《为加强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文艺报》第五卷第4期。

《全国文联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文艺报》第五卷第4期。

《关于地方文艺刊物改进的一些问题》,《文艺报》第四卷第6期。

丁玲:《为加强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文艺报》第五卷第4期。

《人民文学》编辑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文艺报》1952年第2期。

《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基本情况》,《文艺报》1952年第15期。

刘金锋:《地方文艺刊物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3年第9期。

《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意见》,《文艺报》1953年第7期。

胡风:《致王元化》,《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

⑪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8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⑫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1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279页。

⑬郭小川:《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⑮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⑯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⑰郭小川:《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⑱郭小川:《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⑲《办好文学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⑳《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要求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日报》1956年12月4日。

㉑《办好文学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㉒参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㉓《风雨47载,辉煌400期——〈飞天〉沿革》,《飞天》1997年第8期。

㉔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㉕吕剑:《未完的回忆》,《诗刊》1976年第1期。

- ②6白婉清:《〈诗刊〉忆旧思今》,《诗刊》1997年第1期。
- ②7李汗:《文艺刊物需要“个性解放”》,《文艺报》1957年第9期。
- ②8朱树鑫:《决不允许右派分子篡夺文艺刊物》,《文艺报》1957年第24期。
- ②9周扬:《解答几个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0页。
- ③0敏泽、李世涛:《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 ③1郭小川:《在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受批判、再检查》,《郭小川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209页。
- ③2刘绍堂:《哭苦命的李岸兄》,《我的创作生涯》,中原农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
- ③3朱树鑫:《决不允许右派分子篡夺文学刊物》,《文艺报》1957年第24期。
- ③4陆文夫:《又送高晓声》,《收获》1999年第5期。
- ③5“探求者”:《月刊社的章程和启事》,《雨花》1957年第10期。
- ③6吕剑:《未完的回忆》,《诗刊》1976年第1期。
- ③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3页。
- ③8《办好文学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 ③9黎之:《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 ④0秦兆阳:《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71页。
- ④1秦兆阳:《一个老编辑的唠叨》,《举起这杯热酒》,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 ④2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页。
- ④3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
- ④4黎之:《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 ④5黎白:《回顾总政创作室反右派运动》,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 ④6黎之:《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宣传工作会议”》,《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 ④7石天河:《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 ④8刘绍堂:《哭苦命的李岸兄》,《我的创作生涯》,中原农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
- ④9巴金:《悼方之同志》,《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
- ⑤0敏泽、李世涛:《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 ⑤1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34页。
- ⑤2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页。
- ⑤3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人民文学》1957年第10期。
- ⑤4朱树鑫:《决不允许右派分子篡夺文艺刊物》,《文艺报》1957年第24期。
- ⑤5《本报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检查编辑工作中的错误 展开反右派的斗争》,《文艺报》1957年第15期。
- ⑤6姚文元:《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艺月报》1957年第12期。
- ⑤7黄秋耘:《中国作协的几番风雨》,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 ⑤8《中国组作家协会改进期刊编辑工作》,《文艺报》1957年第38期。

作者简介 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

